

新发展格局构建重点及其 财政政策应对

韩 超 崔 敏

(东北财经大学,大连 116025)

内容提要:面对更加不确定和不稳定的世界大环境,结合我国经济社会所处的发展阶段,党中央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新格局的构建重点在于扩大内需,打通国内在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四个环节的堵点和痛点,加强自主创新能力,推进外贸高质量发展。在这个大的时代背景下,发挥财政政策的积极作为作用,应秉持“财政整体观”,创新财政制度安排,在提高有效消费和投资,建立国内统一大市场和促进进出口协同发展等方面发力。

关键词:新发展格局 双循环 财政政策 高质量发展 扩大内需

中图分类号:F8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544(2021)10-0015-08

在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目标后,我国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然而,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悄然兴起,大国间博弈加剧,逆全球化的思潮在抬头,以及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世界正经历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更加不稳定和不确定的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环境,习近平总书记在科学认识发展规律和准确把握国内外发展形势的基础上,作出了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重大决策。这一重大决策,是适应我国当前经济发展阶段的主动选择,是应对国际环境急剧变化的战略举措,是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国内经济优势的内在要求,对于我国实现更高质

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对于促进世界经济繁荣,都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财政政策作为宏观调控的一项重要手段,关系着国计民生的方方面面,在推动形成新发展格局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是顺利实现新发展格局的制度保障和重要手段。因此,厘清新发展格局下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和挑战,找准财政政策的发力点和改进点,是理论界需要迫切进行的重大课题。

一、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必然要求

改革开放之初,为积极融入世界大循环中,我

[收稿日期]2021-09-22

[作者简介]韩超,产业组织与企业组织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产业政策与规制;崔敏(通讯作者),产业组织与企业组织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产业经济与创新。

国实施了出口导向战略，通过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先进设备和引进外资和技术，积累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国际市场迅速扩张，进出口急剧增加，2006 年外贸依存度达到 64.2% 的峰值，2007 年经常项目顺差占 GDP 的比重也达到了 10% 的峰值。但是总体来看，我国出口主要以原材料、简单加工贸易产品和最终消费品为主，技术含量低、资源消耗严重，处于世界制造业供应链的低端。随着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一些发达国家开始减少进口，加之我国要素结构的变化，以往靠技术引进和低成本优势扩大出口的方式已不再适用，内需和外需不平衡、投资和消费不协调等问题进一步显现，我国开始谋求新的经济增长模式。2010 年，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扩大内需长效机制，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开始将经济增长动力向国内转变，减少对出口的依赖，货物和服务贸易占 GDP 比重从 2006 年的 36.0% 下降到 2019 年的 18.4%，同时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加研发投入，培育完整国内产业链。

近几年，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发展和全球产业链的调整，全球国际贸易结构发生了明显改变，逆全球化趋势加剧，全球价值链贸易开始回缩（江小娟，2021），新的贸易形态尚未成熟，货物贸易增长速度下降、发展空间缩小（裴长洪，2020），贸易保护主义加剧，贸易摩擦不断，技术引进和产业外移压力增大。与此相反，国内的投资和消费市场拥有大量的潜力，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无法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因此，扩大内需，将大循环的重点转移到国内，支撑并带动国际循环，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成为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必然要求。

二、新发展格局下国内大循环为主体需要关注的重点环节

分析美国和德国两大经济体中各类需求对经

济的拉动作用，发现扩大内需是发达大国经济增长的一般规律（裴长洪，2021）。习近平指出“我们要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更多依托国内市场实现良性循环”。因此，构建新发展格局，关键是疏通这四个环节的堵点，增强供给和需求的适配性，促进要素和产品自由流动，提高国民经济的循环效率。

（一）生产环节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保持高速增长的态势，仅用三十余年便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多种工业产品产值位居世界第一，基本解决了“有没有”的问题。但是，随着我国国民收入的提高，现有商品无法满足人们日益高端化、个性化和服务化的需求，“好不好”成为我们急需解决的问题。过去我国的技术创新主要依靠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模式，一些关键零部件和核心元件依然依赖进口。随着国际环境的日趋复杂，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的发展使得我国创新能力低的问题凸显出来。因此，想要打通大循环中的生产环节，就要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三去一降一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努力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实现自主可控，优化升级产业结构，推动科技创新在畅通循环中发挥关键作用，提高供给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

（二）分配环节侧重公平的收入分配和要素顺畅流动

国内有效消费和投资的增加需要扩大中低收入群体的可支配收入，推进更加公平的要素收入分配格局。目前，学术界对分配环节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城乡收入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上，仅仅改善劳动力收入分配结构是远远不够的，还应包括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的分配。首先，在劳动要素分配上，我国基尼系数已连续 20 年超过 0.4 的国际警戒线，随着以智能化为标志的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兴起，加快了对简单脑力工作的替代，加之疫情对低收入人群的冲击，以及宽松货币政策推升的金融资产价格，

将会进一步提高中高收入人群的财富水平,使收入分配差距进一步扩大(王一鸣,2020)。其次,在资本分配上,金融资源对大型国有企业的偏好阻碍了资本的自由流动,使得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较为突出,金融体系难以很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同时,农村资本的净流出,使得农村金融和实体产业发展受阻,加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再次,在土地分配上,土地供给在空间上的扭曲(韩立彬和陆铭,2018)、土地财政造成的土地价格提升(梅冬州等,2018)等因素,诱发较高的房价,加剧了居民收入的不平等和消费的减少,影响了企业的创新和投资行为。最后,分配问题不仅包括单个生产要素在个体间的分配,还包括要素间的公平分配问题,需要破除制约劳动、资本、土地等要素合理流动的堵点,建立合理的要素间分配机制,矫正资源要素配置扭曲问题,从源头上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实现增长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变。

(三)流通环节强化流通体系的支撑作用

流通是畅通经济循环的基础,是衔接供给侧到需求侧的“大动脉”。首先,要建设国内统一大市场,

健全市场交易体系。在地方“锦标赛”和地方官员政治晋升的激励下,加之一些地区和行业标准、政策不一,我国形成了较多的地方保护主义、行业垄断和市场分割(Xu and Fan,2012),国内贸易存在较高的市场壁垒。因此,破除各地阻碍市场自由交易和公平竞争的制度壁垒,利用数字技术助力构建大市场,形成“进入自由、标准统一、监管一致、数据互通”的统一市场体系,是实现国内大循环的先决条件。其次,要进一步完善现代物流体系,提高流通效率,降低流通成本。近几年来,我国逐步构建了健全的主干交通网络,物流效率和技术也显著提升,快递包裹量已进入日均亿件时代,物流和电商形成了相互促进的良好局面。但是,我国综合交通枢纽和物流网络仍然存在不少堵点,县乡村三级物流配送体系不够健全,公路通行成本和铁路航空货运收费依然较高。2019年我国社会物流总费用14.6万亿元,占GDP的比重降至14.7%^①,高于美国等发达国家8%—9%的比率。就费用结构来说,我国保管费用占总费用的34%,也高于发达国家的25%左右。因此,形成内外联通、安全高效的物流网络,利用数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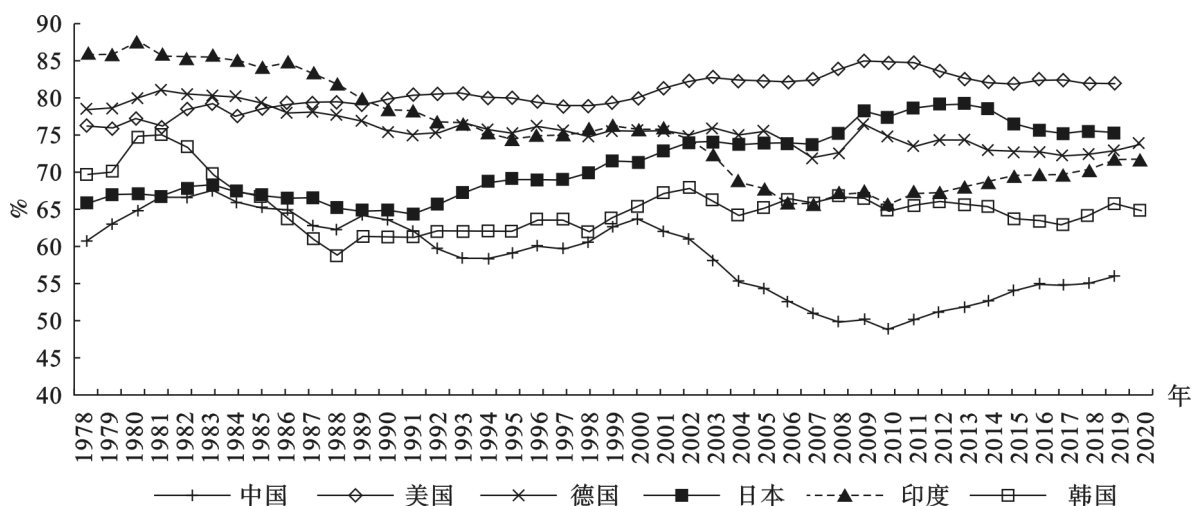


图1 1978年—2020年部分国家最终消费品支出占GDP比重^②

①数据来源:《中国物流年鉴(2020)》。

②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技术、大数据方法提高货物周转速度,减少仓储成本,是打通流通环节的又一重点。

(四)消费环节重在扩大消费和消费升级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于消费重要性的论述为“从商品到货币是一次惊险的跳跃。如果掉下去,那么摔碎的不仅是商品,而是商品的所有者。”消费是畅通国内大循环中最重要的一环,是终点也是起点。我国拥有 14 亿人口,2019 年城镇常住人口达到 8.5 亿人,城镇化率达到 60.6%,国家贫困线以下人口比例由 2000 年的 49.8%下降到 2019 年的 0.6%。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2010 年我国进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人均 GNI 从 1978 年的 200 美元增长到 2020 年的 10610 美元,消费市场潜力巨大。如图 1 所示,我国最终消费率始终不高,从 2000 年的 63.6%降到 2010 年的 48.9%,后又重新上升到 2019 年的 56.0%,但是依然低于同期美国的 81.8%、日本的 75.3%,我国消费市场潜力并没有完全释放。这就需要建立更加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增加居民收入与减负并举,提高教育、医疗、养老等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有效减轻人们的生活压力,持续释放消费潜力。同时,加强市场的科学监管,构建公开透明、活力高效的消费环境,顺应居民消费升级

趋势,优化产品结构,增加优质产品和服务供给,把扩大消费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来,增强消费对国内经济增长的基础拉动作用。

三、新发展格局下促进双循环联动需要关注的重要环节

“融入世界经济是历史大方向,中国经济要发展,就要敢于到世界市场的汪洋大海中去游泳”^①,在大海中学会游泳,在竞争中获得强大。畅通的国内大循环绝不是封闭的,而是一个处处开放的循环,各个环节都应开放融合发展。对外开放应以满足和促进国内供给和需求为前提,推进更高水平的自主创新能力,在更高水平和更深层次参与全球产业链和创新链分工,形成国际国内相互促进的良好局面。总体来说,需要关注以下三个重要环节:

(一)依然重视在全球范围内合理配置资源

全球资源配置是一国或地区在准确分析国内资源状况和全球经济走势的情况下,利用全球资源来优化本土资源配置的方式。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拥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本和技术极为短缺,根据比较优势理论和要素禀赋理论,我国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先进设备、积极引进外资和技术,通过扩大外循环,我国获得了持续较高的增长,积累了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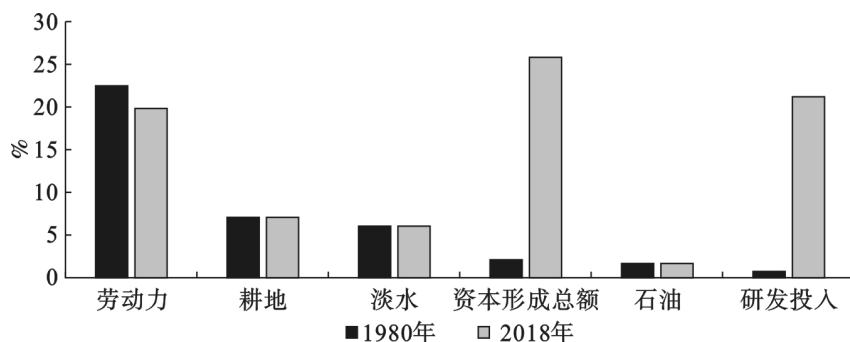


图2 1980年和2018年我国主要生产要素占全球比率^②

^①习近平《共担时代责任,共促全球发展》,《人民日报》2017年1月18日。

^②资料来源:江小涓,《中国对外开放七十年》,人民出版社,2018年。

厚的物质基础。近年来我国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劳动力成本增加,随着资本的持续增加,我国逐渐由劳动力丰富的国家向资本丰富的国家过渡,研发投入占全球比率也从1980年的0.5%增加到2018年的21.2%(见图2)。但是我国自主创新能力仍然较低,继续引进先进技术,双向高度参与全球创新链,仍然是未来技术贸易的主旋律。应通过积极吸引外资投入,获得随外资金流入的技术、管理理念、全球网络等要素,助力我国技术和创新能力向更高层次迈进。耕地、淡水资源、石油受自然禀赋的约束,需要靠国际大循环补充缺口或适当将部分资源消耗型产业外移,为防止国际供给不足给我国带来负面冲击,在进口农产品和资源类产品时适当减少对进口的依赖,并采取多元进口源以分散风险。

(二)通过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世界贸易结构不断发生变化,货物贸易增长速度下降,与互联网技术相关的服务贸易得到快速发展(裴长洪,2020)。近十年我国的服务出口占比维持在10%左右,变化不大,服务进口占比高于出口并一直在增加。反观美国和欧盟15国,服务出口占比一直维持在30%左右^①,成为促进贸易发展的重要源泉。货物贸易发展空间的减少使得贸易摩擦不断,2018年以来美国对我国多次采取技术封锁,加之全球供应链、价值链的调整和国内要素成本尤其是劳动力成本大幅上升,我国在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已经不再具备比较优势,这就要求我们加快自主创新,提高在新一轮技术革命上的投入,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增强对产业链供应链的控制力,建立新的货物贸易优势,同时更加重视数字技术和产品的研发,增强数字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推动贸易结构升级。

(三)持续重点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经济全球化趋势开始

走向低潮,加之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2020年全球外商直接投资(FDI)流量下降35%,比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的谷底低了近20%,为200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②。另一方面,北美、欧洲、东亚三大地区的内部循环逐步强化,世界大循环正在向区域循环转变,以东亚地区为例,2020年以来东盟占中国对外贸易份额提高到15%左右,超过欧盟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据OECD测算,2005年以后亚洲主要的6个经济体日本、韩国、印度、马来西亚、泰国和菲律宾的中间出口主要目的地由日本转向我国,我国在亚太地区的地位稳步上升。我国拥有较为完整的产业体系和供应链体系,在推进“外循环”中强化区域贸易,积极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可以东亚、南亚和东南亚为重点地区,合理利用国外的资源优势进行国际产业布局,适当转移部分劳动密集型和资源消耗型生产环节,主动将我国的产业链和价值链向外延伸,构建国内外生产环节闭环,逐步建立以我国为亚洲主导的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最终实现互利共赢的良好局面。

四、推动新发展格局形成的财政政策选择

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我国的财税体制经历了从“摸着石头过河”到精准“财政公共化”的演变,始终服从并服务于整体改革事业的需要,对我国的高速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高培勇,2018)。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指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可见,财政已经由经济范畴上升到国家治理范畴,成为国家治理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新发展格局的形成离不开财政政策的积极作为。

(一)新发展格局下财政政策遵循的基本原则

在世界百年之未有大变局的外部环境和我国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攻关

^①来源:UNCTAD统计数据库。

^②数据来源:世界投资报告2021年。

期的内部环境的双重压力下,疏通双循环中的堵点和痛点,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势必对财政政策提出了新要求。纵观我国的财政政策发展史,结合当前的经济形势和发展目标,新发展格局下财政政策应遵从以下两个基本原则:

1.树立“财政整体观”。我国的发展和改革从局部转向整体,财政政策也应该从整体观出发,树立正确的“财政整体观”,实现财政政策的更可持续(刘尚希,2021)。纵向上,要完善宏观调控跨期统筹力度,增加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降低微观经济主体对财政政策的依赖,同时对财政风险和公共风险进行动态相机调整,使财政政策与经济发展和风险演变在动态中相匹配,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的长期均衡。目前,财政政策对新发展格局的支持可以概括为“减税降费和增加支出”,这两个方面无疑会增加财政风险,这就要求在制定财政政策时必须全面、科学地评估当前的经济发展形势和财政形势,谋划好“应急性”财政政策的退出机制,减少当前防范或刺激性措施带来长期性风险的可能,将政策的着力点放在释放市场内生动力上,减少经济主体对政策的依赖性,由“强政府”向“强市场”转变,发挥市场对经济调节的决定性作用,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更好结合;横向上,财政政策要和货币政策、就业、环保、产出、区域等政策紧密配合,形成高效协同的集成效应。为应对疫情冲击带来的经济衰退,主要经济体都推出了较大规模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债务水平提升,而产出水平的下降意味着税基的下降,使得债务风险和财政风险加大,当前国内和全球在不同程度面临着“高风险、高货币、高债务”和“低增长、低利率、低通胀”的“三高三低”的问题。在政策制定时,要统筹发力,避免财政资金在宏观调控中微观化和地方化,减少对相关部门产生负的外部性,最终实现供给和需求在时间、空间、结构和数量上的动态平衡,畅通国民

经济大循环。

2.根据新发展格局要求,适时创新财政制度安排。加快形成新发展格局,要积极探索财政制度创新安排,深耕国内市场,重点围绕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展开,构建消费和投资旺盛的国内市场,将投资和出口拉动向消费驱动转换,以内循环带动外循环,以外循环反哺内循环。一是要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当前我国面临较大的收入差距,这种差距不仅体现在家庭与家庭之间,还体现在政府与市场、资本和劳动、城乡之间、行业之间和区域之间。此外,受传统思维影响,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较强,加之住房投资占整个支出比例较高,提高中低收入人群的消费活力受限。需要制定一套行之有效的财政政策,改善收入分配格局,减轻居民生活负担,持续释放消费潜力。二是要发挥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性作用。随着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必然对产品供给提出更高的要求,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效弥补供需缺口,形成强有力的国内大循环。就投资需求来说,我国在一些关键技术领域和重要的产业链条上依然存在未能掌握的核心技术和工艺,随着我国技术的不断攀升,能够模仿的技术空间越来越小,如果在现有结构和技术条件下扩大投资,更多的是一些低水平的重复投资,进而加剧我国部分产业产能过剩问题,这就需要大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提升产业结构升级动力,减少外部技术封锁对我国造成的影响。财政政策不仅要调整收入分配失衡带来的消费需求不足问题,还要引导供给侧进行高质量投资,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同时有效衔接国际产业链和创新链,平衡好公共支出和私人支出,为新格局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二)财政政策助力新发展格局的着力点

在厘清新发展格局内涵和主要任务的基础上,牢牢把握“财政整体观”,创新财政制度安排,建立更可持续的财政政策体系,加快培育更加完整的内

需体系，将扩大内需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以创新驱动和高质量发展引领打通“双循环”的堵点和难点，推进国内大市场为主、国际贸易协调发展的相互促进局面，财政政策可从以下几点发力：

1.通过财政政策引导，推动稳就业、均分配、促保障，提振居民消费。消费是扩大内需的基础，是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是推动新发展格局的前提。我国拥有世界18%的人口，但最终消费仅占12%，拥有较大的消费潜力。激发潜在消费需要从增加居民收入和提高社会保障两方面入手，使居民有钱花、敢花钱。

首先，就业是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是改善民生、扩大消费的基本支撑，一直以来已有大量促进就业的财政政策颁布，虽然获得了较大成效，但一些财政政策指向性不够明确，在具体执行时难以落地，就业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因此，需要提高财政政策的针对性并细化落实，总体来说可以从减税降费、提高市场主体活力以扩大就业岗位，提高劳动者技能、强化就业公共服务以缓解就业结构性矛盾，增加失业保障和创业支持力度以平滑居民收入三个方面着手。

其次，有了基本的就业收入，还需要更加公平的收入分配调节制度，以缩小收入差距、扩大中等收入人群。财政是国家进行收入再分配的主要调节手段，目前我国税收和转移支付等收入调节制度力度不足，财政再分配整体上加大了收入差距（汪昊，娄峰，2017），税收过多依附于商品和劳务，对资本所得调节不足，对不同群体和行业的再分配调节较弱，加之监管力度不足，使得中低等收入群体承担了大部分税负，不利于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岳希明等，2014；米增渝等，2012）。因此，需要设立涵盖不同行业、收入人群、要素等方面更加公平的财政调节机制，优化财政收支结构，减少间接税比重，同时在个人所得税制度中逐步由分类税制向综

合税制改革，推进住房消费健康发展，切实缩小贫富差距，提升消费潜力。

最后，健全保障社会民生事业，减少预防性储蓄动机，让居民敢消费。目前我国城乡发展依然存在较大的差距，社会保障制度多偏向城市人口，农村发展较为滞后，财政投入多偏向社会保险而对社会福利和社会救助投入不足（王延中等，2016），转移人口不能享受公平的基本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因此，要打破社会保障系统的户籍制度壁垒，推进城乡统筹发展，加大社会保障政策的宣传力度，提高转移支付和社会保障性支出，进一步强化基本社会保障制度的公平性，同时配合教育、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减少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

2.通过财政政策激励创新驱动，拓展投资空间，建立国内统一大市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技水平和产出能力取得了飞跃式的发展，已经建立起较为全面和独立的产业链体系。但是，从近两年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对我国施行的技术封锁和我国的贸易结构来看，我国在高新技术产业的核心生产环节仍然存在“卡脖子”问题，国内大市场存在较大的贸易壁垒。

一方面，提高基础研究和原创水平，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良好机遇，是促进我国产业链高级化，实现高质量发展和新发展格局的内在要求。当前，我国科技资源掌握在多个不同的部门里，存在科研项目重复、资金管理不科学、使用效率不高、财政科技资金使用绩效评价不合理等问题（刘方，2021），未能充分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企业自主研发激励较小。财政政策可增加税收优惠政策，提高制造业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以鼓励企业进行自主研发；优化财政科技资源配置结构，整合科技资源，加大对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的投入，通过政府引导资金、专项资金等方式加快科技成果转化，解决供应链、产业链的断点和堵点等问题；鼓励全社会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增加新型基

基础设施投资,为创新驱动和新发展格局的发展奠定扎实的人力和物质基础。

另一方面,建立统一大市场,畅通要素和产品循环,是实现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内容。在财政分权体制和地方保护主义等因素的影响下,我国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拥有较大的国内贸易壁垒,各地产业结构相似(Young,2000),我国企业被锁定在全球价值链低端,阻碍了价值链的攀升(张杰等,2010;吕越等,2018),难以发挥国内市场的规模经济优势。形成国内统一大市场,要破除地方保护主义的财政原因,使地方财权、事权相匹配,减少地方对流动性税基和共享税的过度依赖,重塑中央和地方的纵向财政关系。同时,构建地方政府横向税收协调机制,健全增值税留抵退税制度,较少增值税抵扣链条断裂,促进产业间分工互联(范子英,2021)。

3.通过财政政策结构性推动进出口和国际投资协同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国内国外融合发展是实现新发展格局的内在要求。目前我国财政政策对贸易的支撑不够,无法很好地应对风云变幻的世界变局,如:在进口环节,一些有利于经济民生的进口商品仍然征收较高的税收和存在政策壁垒,不利于在“引进来”方面发挥更好的作用;在出口环节,对企业境外收入存在较为严格的税收抵免政策,不利于企业“走出去”。首先,要完善进出口税收体制,加强税收领域国际间合作,建立国家层面的统一税收优惠政策,降低关税总水平,同时,为自贸区提供更多资金支持,促进中外经济体投资合作,满足国内生产和消费的多样化需求。其次,财政政策与产业、贸易政策要做好协调配合,利用国外的生产要素和资源将中国的产业链、价值链向外延伸,构造以中国为主导的亚洲供应链网络。最后,通过加大财税的优惠力度在“一带一路”多边区域范围内共建工业园区,为“一带一路”项目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支持,加快与邻

近国家的互联互通,同时强化风险意识,合理评估东道国的债务能力,保障财政安全。

参考文献:

- [1] 裴长洪,刘洪愧.构建新发展格局科学内涵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21(6):5-22.
- [2] 刘方.构建与新发展格局相适应的财税制度与政策研究[J/OL].当代经济管理:1-13.
- [3] 刘尚希.实现财政政策的更可持续[N].北京日报,2021-05-10(11).
- [4] 范子英,李经.“十四五”时期促进国内统一市场形成的财税改革思路[J].税务研究,2021(2):5-11.
- [5] 江小涓,孟丽君.内循环为主、外循环赋能与更高水平双循环——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J].管理世界,2021,37(1):1-19.
- [6] 王一鸣.百年大变局、高质量发展与构建新发展格局[J].管理世界,2020,36(12):1-13.
- [7] 裴长洪,刘洪愧.中国外贸高质量发展:基于习近平百年大变局重要论断的思考[J].经济研究,2020,55(5):4-20.
- [8] 韩立彬,陆铭.供需错配:解开中国房价分化之谜[J].世界经济,2018,41(10):126-149.
- [9] 吕越,盛斌,吕云龙.中国的市场分割会导致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下降吗[J].中国工业经济,2018(5):5-23.
- [10] 高培勇.中国财税改革40年:基本轨迹、基本经验和基本规律[J].经济研究,2018,53(3):4-20.
- [11] 梅冬州,崔小勇,吴娱.房价变动、土地财政与中国经济波动[J].经济研究,2018,53(1):35-49.
- [12] 汪昊,娄峰.中国间接税归宿:作用机制与税负测算[J].世界经济,2017,40(9):123-146.
- [13] 王延中,龙玉其,江翠萍,徐强.中国社会保障收入再分配效应研究——以社会保险为例[J].经济研究,2016,51(2):4-15+41.
- [14] 岳希明,张斌,徐静.中国税制的收入分配效应测度[J].中国社会科学,2014(6):96-117+208.
- [15] 米增渝,刘霞辉,刘穷志.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财政均衡激励政策研究[J].经济研究,2012,47(12):43-54+151.
- [16] 张杰,张培丽,黄泰岩.市场分割推动了中国企业出口吗?[J].经济研究,2010,45(08):29-41.
- [17] YOUNG A.The Razor's Edge:Distortions and Incremental Reform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2000(4):1091-1135.

【责任编辑 孟宪民】